

粵港澳三地大學英語課程發展的路徑依賴 ——以華南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為例

曹樂怡*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 澳門)

摘要: 本文以華南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為例, 運用制度變遷理論中的路徑依賴理論, 分析了粵港澳三地大學英語課程近年來的發展, 指出雖然它們的變革有著不同的特點, 但都是在自己原來路徑上進行, 依賴著原有的一套模式和理念。在最近的發展中, 三所高校越來越強調英語學習的重要性, 但粵澳兩地學校的大學英語學分卻在減少, 語言學習與專業學習的結合, 以及英語課程的人文性培養, 都有所欠缺, 和課程改革前的模式並無太大差異; 相比之下, 由於歷史和社會因素的影響, 香港一直大力推行英語教育, 課改後不但增加大學英語學分, 在與專業學習和人文教育融合上也一直做得較好, 值得粵澳兩地高校借鑒和學習。相信三地的大學英語課程如能取長補短, 優化整合、英語教學定能齊頭並進、協同發展。

關鍵詞: 路徑依賴; 粵港澳高校; 大學英語; 課程發展

Path Dependenc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nglish Program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Universities – A Case Study 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yi CAO*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lleg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a of Path Dependence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ory,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nglish programs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universities is analyzed. With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examples,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universities have followed the old paths and depended on the original modes and ideas in developing their College English programs. Although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learning has been stressed in the program reform,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and Macau have reduced the English course credit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language learning, major learning, and humanity cultivation is not effective, which show the similarities of the College English program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llege English program in Hong Kong universities is more reasonable in terms of the increase of credit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language learning, major learning, and cultivating humanity. If the universities in these three places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to optimize their College English programs, it will benefit not only the universities,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Keywords: Path Dependenc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universities; College English; Program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 2020-07-15, 修訂日期: 2020-08-13。

*通訊作者: 曹樂怡, 女, 在讀博士, 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 英美文學, 教育學。

Email: lyciao@must.edu.mo, Tel: 00853-88972803

0 引言

2017年，我國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國家發展戰略，其中三地的教育合作和協同發展是重要的組成部分。2019年2月，國家公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了更加細化的教育合作計畫，如支援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鼓勵三地中小學校結為“姐妹學校”，建設灣區國際教育示範區等。可見，教育領域多方位的交流合作對於推動灣區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合作的前提是要瞭解各自特點，在各自原有的框架上找尋合作的切入口。本文以粵港澳三地的三所大學為例，分析大學英語課程設置的異同和發展路徑的特點。作者選取華南理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為例，是因為這三所學校都是當地具備實力和聲譽的優秀高校，在2019年中國兩岸四地大學排名前50（香港理工大學第17位，澳門科技大學第20位，華南理工大學第34位），而且它們在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教育示範區專案中都有明確的合作計畫——2019年4月，華南理工大學與澳門大學簽署聯合培養本科生協定^[1]；2019年5月，澳門科技大學與珠海簽署合作協定推動大灣區科技創新^[2]；2019年6月，香港理工大學與五邑大學簽署合作框架協定^[3]。選取大學英語課程為研究對象，原因是大學英語是高校的傳統基礎課程，是培養國際化人才和推動灣區發展不可或缺的要害，而且近年來三地的大學英語課程都在進行不同程度的變革，呈現出不同的特點。本文通過比較三地大學英語課程設置及發展，以期為三地高校在大學英語課程方面的協同發展提供參考。

1 路徑依賴

最早把路徑依賴這一觀點引入經濟制度研究的是美國經濟學家 Douglass C. North。他提出的制度變遷理論成為了新制度主義中研究教育組織變革的重要理論支撐。在該理論中，他將制度和組織

做了區分，將制度定義為“人為去設定的限制，用以制約人的互動行為”，以及人類交換（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及社會的行為）的動機。^[4]制度一旦發展起來並進入軌道，外部網路、自身組織以及因為歷史而產生的主觀模型都會加強這個軌道，使得出現對發展路徑的依賴。^[4]這就是路徑依賴理論，其強調了歷史的重要性。制度由正式規則、非正式約束以及實施機制所組成。^[5]正式規則指具有制約性的法律和規則；非正式約束包括追求行為目標的適當方式原則，如價值信念、意識形態等；而實施機制是指行動的具體操作和實施。正式規則對制度發展的作用是持續和累積的，短時間內不會消除；非正式規則的作用更加持久，因為信念習慣等意識形態的形成和發展需要漫長的時間。這解釋了制度變遷會出現路徑依賴的原因。大學英語課程是人為設定的規則，也是教育方面的行為，它的發展可以看作是一種制度的變遷，受到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的影響，並由特定的實施機制進行具體的操作，因此有明顯的路徑依賴特點。

2 粵港澳三地大學英語課程發展

雖然粵港澳在地理上緊靠彼此，很多文化風俗也同根同源，卻由於歷史的原因，三地的高等教育有著不一樣的特點，其發展呈現出不一樣的路徑，但同時這路徑是各自過往發展軌跡的延續。這一現象也反映在大學英語課程的發展上。

2.1 華南理工大學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也為了服務國家各個領域發展需要，內地高校的大學英語課程進行了一系列的變革，其發展經歷了4個階段：復蘇調整期（1978-1984年），穩定發展期（1985-1993年），加速發展期（1994-2000年）和多元發展期（2001-2018年），每一個時期變化都依託於前一個時期發展，是同一個發展路徑的延續。^[6]

廣東高校的課程設置及發展源於自上而下的

政策推動，在國家教育部的指導下進行。改革開放後國家大學英語課程第一份真正意義上的教學大綱，是1980年頒佈的《理工科外語教學大綱（草案）》。它對英語聽說讀寫都提出了要求，特別強調培養學生閱讀專業英語書刊的能力，但不提倡過早將英語學習和專業學習相結合。1985年公佈的針對高校理工科學生的《大學英語教學大綱》和1986年公佈的針對高校文科學生的《大學英語教學大綱》，在80年大綱基礎上，根據聽說讀寫四項技能，把大學英語課程分為精讀、泛讀、聽說和寫作。1999年頒佈的《大學英語教學大綱（修訂本）》合併了85年和86年的大綱，對聽說讀寫分別作了要求，這是首次統一了課程設置與教學要求。而在最近的大學英語課程改革中，即2007年正式實施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以及2015年公佈的《大學英語教學指南》，提出英語學習和專業學習的結合，也強調了“要培養‘人文性’，對國外的文化有所瞭解，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但這是“以‘提高學生聽說讀寫等英語語言素養’為前提”。^[6]可見一直以來，內地大學英語課程是以聽說讀寫四項技能為基礎來設置，並以此為出發點進行變革。

正式規則的持續性，使得大學英語課程發展也依賴於之前的發展路徑。以華南理工大學（下稱華工）為例，其大學英語課程的設置一直以聽說讀寫這四個基本技能來劃分課程種類，分為綜合課（讀寫為主）和聽說課，以培養語言能力為目標，不包含專業英語或專業知識等內容。在2012年以前，大學英語課程占16個學分，兩個學年修完；2012年至2018年，學分減少為8個學分，一個學年修完；到了2019年，學分更減少為6個學分，一個學年修完。通過採訪一位華工資深英語老師瞭解到，減少學分的目的是為了從通用英語向學術英語和專業英語轉型，讓學生有更多的時間學習英語講授的專業課。在最新的課程變革中，即從2019級開始，華工的大學英語課程分為學術英語、大學英語、通識課三類，並根據學生入學時全校分級考試成績劃分A班、B班和藝術

班，三類班都開設了綜合課和聽說課，但使用不同的教材。為程度較好的A班開設了結合專業和學術知識的綜合課（學術英語）；而B班和藝術班的綜合課（大學英語）則還是圍繞著傳統的聽說讀寫等英語基本能力。可見雖然變革在推進，但是在傳統英語課程設置的基礎上進行，而且變革只集中在部分英語水準高的學生，大部分學生上的還是傳統英語課。

除了正式規則的影響外，非正規的約束也使得華工的大學英語課程脫離不了原來的路徑軌跡。

“長期以來，我國的外語教育受傳統文化和教育制度的影響，過於強調它的工具性……忽略其人文性和交際性。”^[7]華工在新課程要求的指導下，開設了一系列的人文類通識選修課，如英語歌曲欣賞與英美文化、跨文化交際、雅思英語、英語詩歌選讀等，但在2018年前只要求A班學生在修完大學英語課程後選讀一門全英教學通識教育課程，占2個學分，而B班和藝術班的學生則沒有這個規定。從2018年開始，全部的學生都採取自願的形式選修大英通識課，這直接導致了選課的學生人數大幅度減少。換言之，學生只需要修滿6個學分的大學英語課程（即綜合課和聽說課）即可。這樣的課程設置和要求還是停留在80年代《大綱》路徑上，無法真正意義上培養學生的人文性和跨文化交際能力。

2.2 香港理工大學

由於英國殖民的這一段歷史，英語在香港有著特殊的地位和意義。Evans把香港的英語教育政策大致劃分為兩個時期：殖民時期（1842-1997年）和特別行政區時期（1997-今）。^[8]第一個時期，港英政府為了實施文化殖民和思想殖民，在1877年提出“所有政府學校皆有實施英語教育的必要”^[9]，大力推行英語教育，特別是模仿英國本土的教學模式，以英語作為授課語言來教授其他課程。此外，香港高校迫於港英政府的壓力，放棄國際流行的學制模式，改用英式的“五二三”

學制，即五年初中，兩年高中和三年大學。回歸後，中文的地位得到提升，形成現在“兩文三語”的現象（兩文指中文和英文，三語指普通話、英語和粵語），並在 2012 年恢復“三三四”學制，即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和四年大學。但英語的重要性在社會的方方面面仍然沒有減退，這體現在香港高校的大學英語課程設置上，其發展也出現路徑依賴的跡象。

以香港理工大學（下稱港理工）為例。成立於 1972 年的港理工，在長時間裡一直採取三年學制，而且受到港英政府的英語教育政策影響，所有的專業課程都是以英語授課，即 EMI（English as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沒有開設專門針對非英語專業學生的英語語言課程。這樣的設置，並不是以教育或者語言學習為出發點，僅僅是簡單複製了英國本土的教學模式。^[8]當時“大學英語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養英語流利的殖民地精英”，^[10]這也說明了英語在香港高校教育中的重要性，以及其工具性的特點。而後隨著對外語教學與學習理論的重視和運用，港理工以“英語教學中心”為依託，大力發展大學英語課程，為內地學生開設英語語言的基礎課程，為基礎較差的學生開設通用英語課程，還有多達幾十門的專業英語課程供學生修讀。根據每個學院的要求，每個學生必須修讀 2-9 個學分的專業英語課程。^[11]2012 年新課制改革後，原來的專業英語課程不變，而大學英語語言課成為了學校的核心課程，學生必須要修滿 6 個學分，再加上必須選修一門 3 個學分的文學類英語課。因此，在新課制下，每個學生至少要修滿 12 個學分的英語課程。英語學分增加，說明英語的重要性並沒有隨著回歸而減少，其工具性的特點也沒有大的變化——英語語言課的課程目標“旨在通過提高學生的語言能力滿足學術和專業上的需求”^[12]。換言之，英語語言課程和專業英語課程，都是為了之後修讀用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做準備。

香港高校的大學英語設置，也受到了非正規約束的影響。由於英語是香港的法定語言，法律

用語和政府公文用語都是英文，英語水準也成為政府公務員的重要條件之一。此外，由於香港國際化的程度非常高，英語在不同的工作領域，甚至日常生活中，都被普遍使用，甚至有“重英輕中”的社會風氣。^[9]如香港政府從 2000 年開始推行職業英語運動，旨在在市民當中推廣職業英語，提高在職人士的英語水平。所以無論回歸前和回歸後，學生的英語水準都與他們的就業以及職業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必定導致香港高校保留 EMI 專業課程，而大學英語語言課程和專業英語課程的設置為專業課程服務。

2.3 澳門科技大學

雖然澳門和香港有著相似的殖民地歷史，但兩地的大學英語課程發展存在著很大差異。從歷史上來看，“港英政府一直把香港高等教育作為帝國主義的一項重大投資”，而“澳葡政府……扮演被動者的角色，讓澳門高等教育長期處在故步自封和隨波逐流的狀態”。^[13]因此澳門的英語教育長期處於邊緣化的狀態，缺乏正式規則的約束。由於英語從來不是澳門的法定官方語言，在回歸前，英語教學得不到澳葡政府的重視。回歸後，隨著澳門國際化程度日益提升，作為世界交流語言的英語對於這個城市發展起到的作用越來越重要。^[14]澳門特區政府開始重視英語教學，但澳門各級學校的英語課程一直以來都沒有統一的教學目標、沒有統一的課程要求、也沒有統一的水準考試，各自為政，自成一系，不同學校的學生英語水準差異也非常大，面對如此複雜的教育現狀，特區政府難以在短時間內理出頭緒進行整改。^[15]因此英語教學邊緣化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諾斯認為，“非正式約束主要來源於由文化傳承而來的社會資訊，這種資訊是關於如何解決人類協調問題的慣例、行事準則或行為規範，”而這些慣例、準則或規範，甚至“比正式約束更為重要”。^[16]所以雖然正式規則約束缺失，但在非正式約束的影響下，澳門大學英語課程發展也

出現了路徑的依賴。

澳門各個高校獨立設置自己的英語課程，存在很大差異，但在相同的歷史、文化、社會等非正式約束的影響下，各校的大學英語課程還是有著類似的發展路徑，如澳門最大的兩所綜合性大學——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近年都在削減大學英語課程的學分。本文以澳門科技大學（下稱澳科大）為例。澳科大成立於 2000 年 3 月，和澳門回歸同時期。該校的大學英語屬於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是全校所有學生必修的基礎課程。由於初期的英語課程設置參照了內地高校的模式，所以也是以聽說讀寫這四個基礎技能來劃分課程種類，具體分為一級閱讀課和聽說課，以及二級閱讀課和聽說課，一共 20 個學分，使用的教材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學英語》系列。在 2007 年特區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高等教育應推行通識教育，培養一專多能，具備廣闊的知識視野，善於從不同的知識範疇中提取靈感，得出豐富思考成果的人才。在 2009 年，“隨著澳門新任特首崔世安上任，……澳門高等院校不斷與國際高等教育事業接軌，吸收多元辦學理念，改革本科生課程和教學，不斷提升教學素質，邁向國際。”^[17] 因應澳門國際化發展的需求和政府提倡的通識教育多樣性，澳科大的英語課程進行了改革，閱讀課和聽說課的課本換成了國外的原版教材，並增設了五門（一共 10 個學分）全英授課的人文類通識選修課，包括英美文學選讀、翻譯技巧、西方電影賞識、社會時事、學術寫作 / 應用寫作。但這些英語通識課是提供給由於入學英語成績優異而免修一級閱讀課和聽說課（10 個學分）的學生修讀，大部分學生上的還是傳統的聽說讀寫課程，並沒有機會修讀這些英語通識課。2019 年，澳科大的大學英語課程學分大幅減少，從 20 個學分減少為 12 個學分，目的是為了學生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專業學習。但閱讀課和聽說課的課程類型並沒有變化，而五門英語通識選修課減少為三門，分別為中英實用翻譯技巧、電影中的社會文化、應用寫作，同樣只面對部分學生開

設。可見，英語課程還是著重培養學生聽說讀寫四項語言基本技能，和建校初期並無大的差異，而且英語人文類通識課的效果也沒有很好地體現出來。

3 路徑依賴理論下三地大學英語課程比較

由三所高校的大學英語課程發展來看，沒有出現革命性變革，而是沿著既定的並在後來發展中逐步強化的路徑，以漸進的方式進行，產生路徑依賴的現象。根據諾斯的制度理論，路徑依賴一般會產生兩種制度發展趨勢：正效應和負效應。路徑依賴的正效應表現在“制度在初始制度的基礎上，通過不斷地學習、協調和適應，進一步向更完善、更發達的境地變遷，……從而使制度呈現良好的變遷軌跡；路徑依賴的負效應則表現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在現實生活和經濟發展中也不能得到有效支援，但這些組織……維護和加強現有制度，……從而使這種無效的制度變遷的軌跡維持下去，直至形成制度的路徑閉鎖”。^[18] 要避免路徑閉鎖的出現，“往往要借助於外部效應，引入外生變數或借助政權的變化，也就是存在外部壓力和內部危機。”^[18]

在大灣區高校教育合作交流的大趨勢下，通過瞭解彼此的英語課程特點以及發展趨勢，取長補短，借此作為“外部壓力”來打破路徑依賴可能引起的負效應，以推動三地大學英語課程的協同發展。

首先，由於國家和地區國際化發展的需要，學習英語的重要性越來越得到三地政府和學校的重視。但在最近的變革中，廣東高校（以及很多內地高校）和澳門高校的大學英語課程學分在減少，而在英語普及度更廣的香港，大學英語課程學分則在增加。雖然粵澳高校英語課程學分減少的初衷是為了讓學生有更多的時間來學習 EMI 專業課程，但有內地高校學生英語學習滿意度的調查表明，相當部分學生的英語學習意願非常強烈，

但對於自己進入大學後的英語學習成效不滿意^[11]；也有研究指出，澳門高校的學生在學習以英語講授的專業課時，有語言上的困難^[14]。由此可知，在學生學習英語需求增加的前提下，減少大學英語課程的學分，是值得商榷的做法，有可能抑制學生學習英語的熱情，影響學習效果。相比較而言，香港增加學分的做法更符合實際需求。

其次，粵港澳三地高校都在強調英語學習和專業學習的融合，因為“……一個合格的大學生，他們都必須具有用英語閱讀本專業文獻，瞭解本學科國際前沿發展的能力”^[19]。但廣東高校和澳門高校的大學英語課程還是沿著老路子，以單純訓練語言技能為主，就算有嘗試進行結合，也只是在小範圍內實施。而香港高校 EMI 專業課程始於殖民時期，最近的改革中，在語言學和二語習得等學科發展的推動下，不但增加了英語語言基礎課程，而且在鞏固語言基礎後，開設專業英語課程供不同專業的學生修讀。港校的教學模式頗為成功，體現在全球大學就業能力排名上。該調查對全球多個國家及地區的大學畢業生就業能力做出評估，其中一個標準包括英語專業基礎。2014 年的排名中，香港居亞洲第一；到了 2019 年，中國只有香港一所高校沖進了該排名的前十。可見，香港高校在英語學習和專業學習的融合方面做得更到位更全面，因此粵澳高校可以參照香港的做法，在原有語言課的基礎上增設專業英語課程，為之後的專業課程英語授課打下堅實的基礎。

除了上述英語和專業的結合，即語言的工具性得到重視，人文性教育也是粵港澳三地高校大學英語課程改革的方向。這符合全球教育發展的趨勢。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提出的核心素養框架中指出教育應“堅持終身學習的理念，以培養完整的人為價值取向，以個體的成功生活和社會的和諧發展為基本目標”。^[20]因此，我國有學者指出，外語教育不但要教會學生語言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幫助學生形成“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需要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發展全

球勝任力。這正好說明，外語教育要堅持人文之道。”^[21]本文提及的三所高校都開設了人文類的英語通識選修課，但具體的做法則略有不同。華工開設了各種內容豐富的英語通識課，但由於不要求學生必須修讀，最後導致選修的人數激減；澳科大的英語通識課不多，在最近的改革中數量又減少了兩門，而且這些課程只面向部分學生開設；港理工的英語通識課一共有七門，涉及文學閱讀和寫作，但要求每個學生至少選修一門。如此看來，在大學英語課程中，港校的做法更突現人文性的培養，而粵澳高校的英語通識課則被邊緣化，重要性大打折扣。所以，粵澳高校可以向香港高校學習，要求學生至少修讀一定學分的英語通識課，開闊他們的視野，培養學生人文性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4 研究結果和不足

粵港澳三地高校的大學英語課程在變革，由於三地的歷史和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它們的發展有著不同的特點，但變化都是在自己原來路徑上進行，依賴著原有的一套模式和理念。雖然作為世界通用語，英語的作用越來越被三地政府所重視，但英語在香港還有著特殊的意義，並且從殖民時期開始政府就大力推行英語教育，所以香港高校的大學英語課程設置更為完善和合理。廣東高校跟隨著全國高校的改革浪潮，大學英語課程所占學分變得越來越少，與專業結合和體現人文性這兩方面也有所欠缺，這很可能沒法滿足學生學習英語的需求。英語這一科目在澳門長期被忽視，雖然近年來由於全球化發展的需求，英語教學的地位得到提升，但歷史因素對高校英語教學的影響似乎並沒有消散，大學英語課程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通過瞭解三地大學英語課程的發展路徑，並分析它們之間的差異，發現粵澳兩地大學英語課程的問題以及港校的優勝之處，希望能對三地的大學英語課程發展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相信如能取長補短，優化整合原有課程，三地的

大學英語教學定能齊頭並進、協同發展。

但本研究也存在著不足之處。首先，由於只選取了三所高校作為例子進行分析，不一定能代表著三地其他高校的大學英語課程發展情況。其

次，這三所學校學生的入學英語水準存在一定的差異，這可能會影響到學校英語課程發展的路徑。希望這兩個問題在未來的研究中，得到深入的探討。

參考文獻

- [1] 王娟, 華軒. 華工與澳門大學簽署2+2聯合培養協定對[EB/OL]. (2019-4-11)[2020-1-10]. https://www.sohu.com/a/307183453_119890.
- [2] 胡瑤. 澳門科技大學與珠海簽署合作協定推進大灣區科技創新[EB/OL]. (2019-5-27)[2020-1-10].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5/27/c_1124548702.htm.
- [3] 董有逸. 五邑大學與香港理工大學簽署協議，攜手研發環保紡織材料[EB/OL]. (2019-6-8)[2020-1-10]. http://kb.southcn.com/content/2019-06/08/content_187901552.htm.
- [4]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5] 許長青, 黃玉梅. 制度變遷視域中粵港澳大灣區高等教育融合發展研究[J]. 中國高教研究, 2019, (7), 25-32.
- [6] 孟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學英語課程政策分析[D]. 西安: 西安外國語大學, 2019.
- [7] 楊舒. 大學外語教學改革的路徑依賴、困境及其超越[J]. 教學研究, 2016, 39(3), 62-66.
- [8] Evans, S.. Language Policy in Hong Kong Education: A Historical Overview. European Journal of Language Policy, 2017, 9(1), 67-84.
- [9] 李學書. 滬港台英語課程發展[M]. 上海: 上海大學出版社, 2018.
- [10] 王冬青. 英語的身份: 後殖民視野下的香港大學英語學科改革[J]. 江蘇第二師範學院學報, 2016, 32(9), 69-73.
- [11] 蔡基剛. 關於大學英語課程設置與教學目標 --- 兼考香港高校大學英語課程設置[J]. 外語教學與研究, 2011, 43(4), 609-617.
- [12] 曹蕾韻. 香港高校的課程改革及啟示 --- 以香港理工大學為例[J]. 大學(研究版), 2017, (4), 65-71.
- [13] 黃發來. 澳門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現狀研究—基於澳門大學和澳門科技大學的調查[D]. 廈門: 廈門大學, 2017.
- [14] Botha, W.. 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at a University in Macau: Policy and Realities. World English, 2013, 32(4), 461-475.
- [15] Lau, I.. TBL in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in Macau: Effects on Chinese Tertiary Learners' Beliefs and Motivations. Nottingham: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2009.
- [16] 蔡瀟彬. 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研究[J]. 東南學術, 2016, (1), 120-27.
- [17] 馬早明. 港澳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模式研究[M].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17.
- [18] 馬耀鵬. 諾斯路徑依賴理論的基本要義探究[J]. 科學·經濟·社會, 2009, 27(2), 98-101.
- [19] 蔡基剛. 再論我國大學英語教學發展方向: 通用英語與學術英語[J]. 浙江大學學報, 2015, 45(4), 83-93.
- [20] 喬鶴, 徐曉麗. 國際組織全球教育治理的路徑比較研究—基於核心素養框架的分析[J]. 比較教育研究, 2019, (8), 52-58.
- [21] 蔣洪新. 外語教育的人文之道. 王定華, 曾天山編, 民族復興的強音—新中國外語教育70年. 北京: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9.

學生活動

廈大教授與澳科大酒旅師生探討“目的地的社區居民問題”

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下稱“酒旅學院”）於2020年6月30日組織舉辦暑期學術系列活動第五場之“目的地的社區居民問題”線上工作坊。本場工作坊邀請了廈門大學林德榮教授進行分享，酒旅學院院長吳國民教授、張楊課程主任等約百名師生參與本場學術講座，活動由澳門基金會贊助。

林德榮是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旅遊與酒店管理系教授、全國旅遊管理專業學位（MTA）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高等學校旅遊管理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其主要研究領域是旅遊企業管理、旅遊市場和消費者行為。

在本場學術工作坊中，林教授對旅遊開發與社區居民的利益關係作出分析並提出應對策略。他指出，做好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處理好旅遊開發與社區居民的利益關係。酒旅學院師生就講題展開熱烈的討論和交流，針對同學們關於如何緩解主客衝突等的提問，林教授從資源環境、經濟利益、生活習慣等方面耐心分析，講解解決問題的對應措施。